目　录

1.早期共产党员在绵阳办学简介
记谭德政领导的绵阳日新小学
绵阳市中区党史办
2.绵阳双桥事件的调查……耕牛
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忆……王梓谦
4.建国前绵阳金融机构和货币流通情况……周　诚
5.民国时期绵阳县税务概况
绵阳市市中区税务局《税务志》编写组
6.民国时期绵阳合作实验区史略……李光福
7.绵阳地势、气温、雨量和水利、电力设施概况
……徐举百
8.我县解放前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简况
……工商行政管理局供稿
9.绵阳盐场简况……安居泊、安光汉
10．建国前绵阳城关造食业的概况……甘英杰
11．绵阳城关手工业发展状况……陈友德
①绵阳针织二厂发展过程
②绵阳城关服装业发展简史
③绵阳制革业简况
④绵阳木器

早期共产党员在绵阳办学简介

绵阳市中区党史办

绵阳日新小学（在现在小枧乡）是由绵阳县早期共产党员谭德政于1928年初创办的。

一九二七年冬，家住绵阳关帝乡的谭德政在江油龙绵师范学校第六班毕业。那时他已由团转党，回乡后，在乡亲们支持下，他即着手创办日新小学，担任了首届校长。他聘请了龙绵师范学校同学冯希贤（又名冯志伊）、李传金（又名李俊卿）、刘景素、龚世经（又名龚作生）为教员，帮助开展工作。谭德政在此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日新小学成为绵阳县第一个革命据点，中共四川执行委员会绵阳通讯处就设在这里。

这所学校开始创办时，是以涪波社员为骨干。涪波社是江油龙绵师校党的外围组织，社名意为：要像涪江的波涛一样，不断前进，英勇战斗。该社的宗旨是："信仰共产主义，研究马列学说，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按青年团的组织原则吸收社员。谭德政、冯希贤、李传玺都是涪波社社员。

一九二九年省委派巡视员来绵阳指导工作，和中共绵阳通讯处谭德政直接联系。谭校长安排他任日新小学训育主任，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下年发展冯希贤入党，至此，学校有共产党员三人。

这所学校的校训是："读书不忘革命"。在学校中修建了纪念"三·三一"惨案碧血池，将各教室命名为"五卅惨案室"、"万县惨案室"等，请美术教员刘景素将惨案的情景绘成图画挂在教室门口，以教育学生读书勿忘革命，勿忘国耻，勿忘救国。

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涪波社，把学校作为革命阵地，在师生中传播革命种子。在教师中组织了读书会，经常学习马列和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政治。在学生中组织了儿童团。学校购买了许多进步书刊，如《鸭绿江上》、《汉江潮》。还创办了《莺鸣报》、《真理报》两张宣传革命思想油印小报。举办了工人夜校和农民夜课识字班，吸收学校附近的盐工和农民入学，培养盐工和农民积极分子。学校还组织师生到丰谷井和松梔乡等地宣传，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讲演活动。

在这所革命空气十分浓厚的学校里，师生耳濡目染，接受了进步思想，不少师生在此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豪绅恶霸左新成、左舜钦等，把这所学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遂以共产党罪名密告国民党二十九军屯殖司令部。一九三〇年六月的一个夜里，驻丰谷井的孙淮武团派一连军警包围了学校，逮捕了冯希贤、李传玺等五名教师，当天谭德政去绵阳教育科领款，本地一位左先生回家，另一位教师去三台，此三人幸免于难。谭德政被迫离乡。这所富有革命盛望的学校，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惨遭扼杀，至此结束了它二年多光荣的历史，但它光辉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写上壮丽的一页。

绵阳双桥事件的调查

解放前，绵阳川西北第一公园右侧附近有一高一低的桥，人们称它为“双桥”（现在工商行政管理局职工宿舍的地方），也有人称它“落魂桥”，因为解放前，长期是绵阳专署、县府、驻军枪毙人的刑场，过双桥不远，沿途都是“乱葬坟”，坟区内坑洼不平，坟堆大小不一，横七竖八，芭茅丛生，白骨露野，野犬拖食尸骨时有所见。夜晚，磷火点点，忽明忽暗，阴森可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绵阳即将解放的黎明前夕，在这里发生了一起秘密的大屠杀，解放后，人们称之谓“双桥”事件。

在“双桥”被杀害的是些什么人？死了多少个？为什么在解放前夕？又是深更半夜？人们议论纷纷。为了弄清事实真象，笔者一九八六年九至十二月份从各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访问，现记叙于后，尚希知情者给予匡正。

一、据绵阳解放前“中统”特务×××讲：解放前夕，在绵阳“双桥”一个晚上就枪毙了十八个人，做得很秘密，事前我们都不晓得，第二天，我们找到“军统”方面的人，问昨晚上枪杀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共产党”。我们说：“是共产党应该由我们来执行。”他们又说：“这是我们从陕西运来的，与你们无关，也来不及和你们商量，万一走漏了风声，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同时共产党很快就要打到绵阳来了”。这不就是“中统和军统”为了邀功领

赏，所发生的相互争执而已。

二、访问了当时的目睹者戴立轩（原名戴学文，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个掉队战士，一九三四年负伤后流落绵阳。解放后，在红联社当工人，现已退休），他说：解放前夕，我在绵阳讨口，住在“双桥”“乱葬坟”不远的草棚棚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我被汽车声、人喊声吵醒，电筒光透进了我的草棚棚，我从缝隙里往外看，“乱坟”里站有国民党军队几十人，他们从汽车上拖下十多人，有男、有女，绝大多数穿的是军衣，也有穿黑棉袄的。那些军警人员，有的提马灯，有的打电筒，有的在清点人数，枪声响后，我听见一个士兵在向他的长官报告：十八个已枪毙完毕。有一个军官说：“快拖下坑去掩埋了”。第二天我到乱葬坑里去拾柴火，看见一滩一滩的血迹，那里的芭茅被踩得巴了地。他又说：解放后，一个曾参与那晚行动的人在交待时说：那天晚上是杀了十八个人。

三、访问了炭码头（现在涪江纸厂所在地）林家茶饭老板的三儿子，外号人称：“林三娃”，他说：解放前几天，一个晚上，我们正在家里打牌，突然进来几个“丘八”，有的我还认得，他们说：快把灯吹了，今天晚上枪毙人。我们停止了打牌，站在对岸看热闹，马灯把“乱葬坟”照得亮堂堂的，看到枪毙了不少人。第二天早上，来喝茶的人都说：昨晚上大西门、小西门、东门、南门、北门、大西门外的矮子桥、川陕马路都站满了军警、宪、保安队，不准行人通过。出动了大小汽车十几辆，从监狱、城隍庙、绥靖二署等地共装了十八人，一齐拉到“双桥”的“乱葬坟”杀害了。

四、走访了“双桥”做筷子生意的宋家贵夫妻俩。他们说：一九四九年阴历十月廿几头的一个晚上，汽车嘟嘟的从我门口经过，一直开往“双桥”的“乱葬坟”里，我们俩口子站在我房子后面的“吊脚楼”上看见，把汽车上的人一个个拖下来，清点了十八个，每个都是五花大绑，嘴里还塞了东西，有男、有女。宋家贵说：我看见打得惨，就不敢看了。（因为我房子后面的“吊脚楼”只隔“双桥”“乱葬坟”约三、四公尺远）他的妻子说：我硬是看完了的。并说：前几天就在“乱葬坟”里挖坑坑，大小人都不准进去，还派了专人在那里看管。

五、为了把事情搞得更清楚，我走访了绵阳市党史办公室，据他们介绍：一九八六年七月份陕西沔县党史办公室专程来绵阳核实三十七年前发生的这起暗杀事件，并送来沔县党史资料第廿九期。我借阅了这个资料，进一步了解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绵阳“双桥”的“乱葬坟”里，被杀害人的情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战部队。在八年的抗战生涯中，他们深深地懂得了为谁而战的道理，纷纷投身於共产党的怀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罗煜、张明山、宋世元、魏洪涛、杜静华、谢金堂、廖国成等同志被党组织派到汉中、城固等地开展工作。继后又派了伍力（伍凤仙）、高德芳（高秦生）到汉中，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展组织，搞武装力量，迎接解放”。

七月份，中共陕西省汉中地区的地下党员谢金堂同志，接受了党的任务，扮成小贩搭车到凤县途中翻车，谢被甩下

晕倒，敌人从谢的身上发现罗煜、马子实给高慎之的信，遂将谢逮捕，押解汉中。凡是被逮捕的人都是五花大绑蒙上眼睛，装进麻袋，有的悬吊在楼梯上，有的割头示众。每人一付脚镣，每天只准吃一顿饭。采用坐“老虎凳”，鼻子灌辣子水，皮鞭抽打，尿道口穿铁丝，手指穿针，各种残酷手段，摧残人身。十月一日，特务将前后逮捕的七十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中、小学教师、乡、保人员、茶房即：茶馆工人）以及国民党电台台长，以两人同上一付镣，同绑一根绳，运往绵阳城隍庙的驻军营房关押看管，内中有杨虎城、赵寿山的老部下，如罗煜、马子实、陈廷杰、谢金堂、张国宪、董达友、张自友、陈雨臬、石伯瑞、王景春、李建伟、张夫五、魏洪涛、张明山、宋世元、杜静华、廖国成。

十二月十三日，绥靖二署特务叫绵阳保安队来点名，放走了二十多人，运走了三十多人（据说其中有毛泽潭、付鹤岑），在绵阳杀了十八人，来不及杀害的陈雨臬、石伯瑞、张自友、王景春、李建伟被转到绵阳监狱。

绵阳解放后，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找到绵阳的军事代表赵利群说明情况，并要求：把被杀害的人挖出来分别埋葬。未死的希发给路条、路费。军代表赵利群即叫绵阳县政府第一科（民政）科长杨云涛派人办理。在清理被害者遗体时，把认得清的张国宪、罗煜、马子实、谢金堂、陈廷杰、董达友、张夫五七位同志，用棺木分别作了埋葬，并立了木牌。其余的人已认不清了，仍然合埋在一个大坑里。不久（大约二月底），陕西沔县曾派专人前来清理，绵阳县人民政府又协助运回了曾经立了木牌的七具遗体。当时的沔县日

报，曾报导了此事，并对绵阳县政府表示感谢。

根据以上材料说明：被杀害的十八人，应是十八名革命烈士（其中有十一名是中共地下党员，即罗煜、董达友、陈廷杰、张夫五、张国宪、谢金堂、宋世元、魏洪涛、马子实、廖国成、杜静华）。他们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三十八军（原十七路军）任过职，经过“西安事变”，参与过“雪花山”、“中条山”等战斗，有的任过师、旅都副官、营长、连长等职务。打走日本人后，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继续战斗，不幸在绵阳惨遭杀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思昔抚今，缅怀先烈，乃作此记述，以慰忠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忆

王梓谦

陈云同志在总结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宝贵经验时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业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我作为一个县工商联的负责人，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

革，在和平改造的实践中，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为人民作了一些工作。抚今思昔，三十多年的经历，使我深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辉煌成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的创举。

解放前，我是一个经营生丝的商人。四十年代，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下，四川的土丝生产已面临绝境。我所合资经营的丝号遂于一九四〇年倒闭，到解放前夕，仅以一小百货店在困顿中度日。经济地位的改变，使我能以欣愉的心情迎接解放的到来。解放初，我即参加了人民政协的工作，并以工商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筹建绵阳工商联的工作。筹备委员会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协助政府办理各行业工商税。同时还每天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党的政策法令。为支援国家建设，号召工商业者积极认购“折实公债”、“爱国公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五反”运动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开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五反”运动使大部分工商业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经过工人阶级的监督和群众性的检查，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受到打击，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爱国守法的积极性得到伸张，这为以后的和平改造奠定了基础。但“五反”运动对反限制的斗争，并不能改变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因此，有人从疑虑的心理出发，看不到光明前途，抽逃资金，申请歇业，或借口资金短绌，原材料供应有困难，不积极经营。工商联

针对这些情况，在会员中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学习，鼓励和鞭策会员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我作为县工商联的负责人，此时在政府的鼓励下变卖房产，申请经营棉布零售业务，被批准为绵阳第一家棉布经销店。此举对在观望、徘徊中的会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棉布行业在一九五三年底遂全部转入经销，并在一年后发展为代销，通过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县的对私改造在一九五五年有了迅速的发展，六、七百工商户先后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接受了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一九五五年冬至一九五六年春，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潮，我县的工商业者在这场伟大的革命变革中大多数都能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弃旧图新。地、县党委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做了公私合营的大量准备工作，通过大会报告，小会讨论，个别回答疑问，做家属工作等方式，解释政策，消除疑虑，使工商业者看清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公私合营，踏上了脱胎换骨的和平改造的起点。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组织，我县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开始接受申请，我们全行业公私合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夜以继日，全天二十四小时做接待工作，到七月一日拂晓，城关镇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商业者提出了书面申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中小工商业户为了表示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纷纷拿出自己的帐外资财，支援企业扩大再生产。如城区的马兴玉（家属）拿出了自己的私蓄，交金簪一支、金戒指四对、金膀圈一对、银元四百余枚给工商联转交企业。

小商人曾庆华拿出自己几代人相传的“镇家元宝”——银锭两个共一百两和银元二百余元作为投资。在党委领导下，县工商联还会同工会和各国营专业公司成立了清产核资小组，及时开展了复杂的清产核资工作，并对今后私方人员的工作安排和家属就业问题提出了建议。在党的“包下来”和“量才使用”原则指引下，全县私方人员基本上都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有了能发挥所长的职务，不少经营有术和有技术经验的原工商业者还被任命为专业公司、企业的负责人，有的还参加了政府工作，他们中不少的人至今还在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余热，充分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与改造人相结合方针的正确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荣幸地作为会议的代表，参加了这一全国工商业者欢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大会。会议期间，使我永志不忘的是，我十分幸福地两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次是十二月十八日午后，我随全体代表到中南海明伦堂。听说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全体代表，大家都十分兴奋，欢腾喜悦之情不可遏止。代表们整齐队列后，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首长步入会场。毛主席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并大声说：“代表们好！”这时，一千四百多名代表鼓掌、舞帽、欢声雷动，大家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代表们合影之后，亲切地绕场一周，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接见后朱德总司令特地招呼四川代表团留下，先同四川代表一一握手，然后用浓重的乡音说：“几年来大家工作搞得很好，毛主席还要向大家面示今后的工作，希

望你们回去要带好头，为全国工商业者争光，为四川人民争光！”大家听了激动不已，争着向敬爱的的朱总司令问候和汇报情况。下午五时过回到住所，代表们激动非常，直至深夜还有不少人仍在畅谈感受。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四川代表团通知我和温少鹤、黄鱼门三人于当日午夜十二时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待到中南海明伦堂时，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代表参加的一个小型座谈会。凌晨一时，毛主席、陈云、李富春等同志来到会场，亲切地同到会代表一一握手。座谈会一开始，代表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毛主席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并请代表们随便发言。湖南代表向凯第一个发言，毛主席插话说：“你的湖南话连我都听不懂，是否可以说点普遍话？”一下子会场活跃起来，矜持的局面顿时烟消云散，许多代表争着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接着，毛主席对我们与会的二十七位全国工商界代表讲解了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政策，并生动地说明了赎买政策的性质和实施办法。鼓励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一颗颗种子，起好带头作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在公私合营以后，不要以为就“功成圆满”了。还要以企业为基地，脱胎换骨，把自己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主席还对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经营形式和经营原则作了指示，他特别指出“经营形式要有利于群众、方便群众。对经营针头麻线，坛坛罐罐等日用小商品的行业，不要过分集中，比如北京卖馄饨的挑子，沿街叫卖，群众一叫就停下来售卖，如果都集中在一起，群众吃碗馄饨就得上大街，很不便嘛！”毛主席的这些话，在今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毛主席谈笑风生，

深入浅出地讲解党的政策，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这以后，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哪怕是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岁月里，我只要想到我曾握过毛主席宽厚的手，就会热泪盈眶，感奋、幸福之情，克服困难的勇气油然而生。

我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不是“一夜功夫”，“一蹴而就”的。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和平赎买。这个伟大的革命变革是在正确路线和政策指引下，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的。对于广大工商业者说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党的政策的实施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国工商业者的爱国心和社会主义目标能够紧密的结合，证明了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政策的无比正确性。

建国前绵阳金融机构和货币流通情况

周　诚

一、建国前我县金融机构的概况

“银行”是舶来品，我国始称“票号”，后又称为“钱庄”，继后演变为银行。它是经营货币的特种企业。通过存款（包括储蓄）、放款、汇兑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起融通资金的作用。在早的典当业，也曾起过部分融通资金的作用，只是多为解决生活上所需，用于生产上的则较少。清末民初，我县典当业有四家。即：陕西人白永益开设的“永益当”，地址在广东会馆，即现在马家巷对面的一个小巷子内；吴锡真开设的“德丰当”，地址在南华宫巷内；吴××和熊××合伙开设的“庆余当”，地址在德丰当铺背后；吴俊廷开设的“复兴当”，地址在扬公祠，即现在油脂公司宿舍处。这些当铺的资金利息一般按月息三分计算。不满一月的天数，按一月计算。到期不赎取所当之物，则由当铺自行处理。条件苛刻，多系乘人之危，取不义之财。后因战乱影响，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前先后关门停业。

我县最早的钱庄要数“隆顺亨”，它是绵阳县员外郎熊××于清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4年）开设的字号，经商放

债极盛一时，是把商业和金融业合为一体的企业。这种字号在我县以后开设了多起。“隆顺亨”经营了数十年，至清末始关门停业。俟后，又有山西人开设的“天长厚”、“吕和厚”，除经商放债外，还经营汇兑业务。民国初年陕西人白永益又开设了“永顺益”。焦××开设了大盛源，并在丰谷设立分号“仁和源”。以上四家均是商业、金融业合并经营的字号。另有邓祥云开设的“玉通源”钱庄，专做银钱买卖和兑换业务的，不兼营商业，是我县第一家钱庄。该钱庄经营到民国廿四年（1935年）币制改革，法币出笼后，始关闭停业。

民国十七年（1928年）川西北驻军廿九军（军长田颂尧）在潼川（现三台县）开设川西北银行，资本额定为四十二万元。系征收龙（平武）、绵（阳）、安、绵（竹）、德、梓、罗、昭、广、剑、十县一年粮税所得。发行军用钞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共四十二万元。同年四月该军驻县屯殖部在现粮食局所在地设立绵阳川西北银行，是我县开设的第一家银行。该行系为廿九军而设立，主要业务是发行军用钞券，未办其他银行业务。后因资金短绌，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上半年结束。

民国廿五年（1936年）四月，重庆美丰银行在绵阳设立办事处，地址在北街原医药公司处。办理存、放、汇款及仓库等业务，是我县第一家名符其实的银行。经营的时间长达十四年，直至建国后1950年秋，奉总行命令撤销。先后担任办事处主任的有游世才、李季唐、杨丹九等。同年，七月四日，四川省银行在绵阳亦设立办事处，地址在神仙街扬公祠，后又迁往现红星街工商银行营业部处。办理存、放、汇款，买卖有价证券，同业汇票贴现，代办股票、债券的承募

和代还本息，代理金库以及仓库等业务。民国卅七年（1948年）二月，由办事处升为四等分行，直接受总行领导。先后担任主任和分行经理的有：年品三、罗煜峰、佘九滩、方滨生等。1950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县支行清理接管。

民国廿七年（1938年）四月，四川省合作金库派肖觉飞来绵阳筹建县合作金库，五月开业，八月一日开创立大会。地址初设在文庙街十五号，民国卅一年（1942年）六月迁至农民银行绵阳办事处合并办公。初建时，股本十万元，其中信用合作社股金10890元，蚕丝社股金660元，省金库股金28450元，农民银行股金60000元。民国廿九年（1940年）六月股金增为二十万元。其所谓宗旨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调剂农村金融，形同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县联社，其存、放、汇款业务对象主要是信用社。后因通货膨胀，其资金被剥夺殆尽，无力维持，以并入农民银行而告终。

民国廿八年（1939年）五月中央银行绵阳分行开业。地址在文庙街马王庙征收局内，后迁神仙街，即现工商银行营业部。该行系国家银行，并配备有电台一部，办理重庆总行下达的各项任务。历任经理的有甘豫昌、杜义田（民国卅二年因购买汽油，电瓶等浮报价款而被开除）、王恩嘉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卅四年（1945年）九月六日奉命撤销。

民国廿九年（1940年）前后，重庆银行在绵阳设立办事处，地址在北街现百货公司仓库处。办理存、放、汇款等业务。先后担任主任的有周兴西、胡骏一（兼）、陈季明（代），谭枢安（代）、王邈光等人。民国卅五年(1946年)一月一日起，更名为重庆商业银行。民国卅八年(1949年)六

月十五日奉重庆总行命撤销。

民国卅一年（1942年）一月廿日，中国农民银行在绵阳设立办事处。地址在警钟街44号，即现市粮食局处。办理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贷款与投资，土地金融业务，合作事业贷款，农业仓库信托及农业保险，以及储蓄等业务，并兼管绵阳县合作金库。先后任主任的有秦达成、吕则民。民国卅八年，（1949年）下半年奉命撤销。

民国卅一年（1942年）交通银行在绵阳设立办事处。地址在北街川康平民银行内。主要业务是对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存、贷款与投资，国内商业汇款，储蓄和信托等。主任有陈日暄等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卅四年（1945年）十月奉命撤销。

民国卅三年（1944年）七月，绵阳县银行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后正式成立。县银行是根据四川省颁布的县银行规定进行筹建的。民国卅一年（1942年），县政府根据省规定，两次拨款共三万元为建筑费，次年募足商股法币六十万元，官股廿万元，合计股本八十万元。办理存、放、汇款等业务，并代理县库。该行与成都、梓潼、德阳、金堂、绵竹、安县、彰明等县银行签订了通汇合同，规定了相互透支的额率，解付千元汇款，收手续费一元。透支按月息六分五厘计算，存款按月息三分至四分五不等。该行在民国卅六年（1947年）决算时，有红息、股息、公积金等8493万元。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于次年八月发行金圆券，收回法币时，该行数千万元资金贬值为金圆券74元，致使无法经营。该行董事长为吴治安，经理刘良臣。1950年由人民银行接管。